

## 1970 年代初的馬華兒童文學生產與文化定位 ——以馬來西亞《兒童報》為例<sup>1</sup>

廖冰凌<sup>2</sup>

摘要：發軔於 1920 年初的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屬於馬華文學的一環，在漫長的一個世紀裡，共同參與了當地華人與華文文學及文化生產活動，卻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回顧二戰前至國家獨立後期間，馬華文學雖然難以擺脫歷史事件和政治局勢的牽引，仍能在多次的論戰中顧及文學主體的內部發展，唯兒童文學依舊處在邊緣。本文以《兒童報》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此一華人民辦刊物於馬來西亞 1970 年代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能。戰後二十年間，冷戰格局的成形和亞洲發生的系列重大事件，促使東南亞各新生國家急於構建本國意識形態。踏入 1970 年代的馬來西亞雖然在政體上已經擺脫殖民統治，但作為多元民族構成的新興國家，卻一直無法很好地解決種族衝突問題。該時期所陸續制定頒行的政策如國家文化政策、新經濟政策、教育和語言政策等，都涉及各族群在政經文教多方面的資源與權益分配問題。而《兒童報》的誕生，正趕上了政權更替之初，新政權管理者急於施展和表現政綱之際，其

---

<sup>1</sup> 收件日期：2020/10/21；修改日期：2020/12/23；接受日期：2021/02/20  
本文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獎助計畫「當代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與出版文化」（編號：RG016-P-18）之部份研究成果。謹此向基金會及審查本文的兩位匿名專家致謝。

<sup>2</sup>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化定位更是難以不受官方話語影響。如何能夠在編輯內容上做到兼顧與持平，是種考驗。而《兒童報》則體現了兼具國家主義傾向和文藝組織同人特質的追求與實踐。

**關鍵詞：**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兒童報》

##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Culture Position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arly 1970s: A Case Study on *Ertong Bao (Children Weekly)*, Malaysia<sup>3</sup>**

Liau Ping Leng<sup>4</sup>

Abstract: Th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Malaysia, which was developed in early 1920, is a par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or a long century, it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but it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d. Looking back at the period from pre-World War II to post-independent of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gain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even though it could hardly avoid the impact from cruci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s. However,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still on the margins. This article takes *Mingguan Kanak-kanak (Ertong Bao or Children Weekl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rying to explor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is Chinese journal in Malaysia in the early 1970s. In the two decades after the war en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pattern and a series of major events in Asia prompted the new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ager to pursue their

---

<sup>3</sup> Received: October 21,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December 23, 2020; Accepted: February 20, 2021

<sup>4</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laysia.

nation-building and their own ideologies. In 1970s, although Malaysia has already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cultural and ethnic issues are remained unsolved. The policies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during this period, such as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new economic policies,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etc., all involve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right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birth of *Mingguan Kanak-kanak* was just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olitical change, its cultural value and positioning could hardly immune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legal transformations. Therefore, how to achieve balancing in literature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intentions would be a challenge. This article finds the editorial board put their hard efforts in performing the balancing.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Mingguan Kanak-kanak* (*Ertong Bao* or *Children Weekly*)

## 一、前言

發軔於 1920 年初的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屬於馬華文學的一環，在漫長的一個世紀裡，共同參與了當地華人與華文文學和文化生產活動，卻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關注，甚至未能登入文學史的殿堂。這當中的原因約略如下：整體作家作品數量有限，在藝術質量上未能達致均等水平。由於兒童文學的受眾是孩童，年齡和心智屬於未成年階段，故兒童文學作品向來被視為技術含量低，文學性不高的幼稚文本。一般作家對兒童文學創作不以為意，投入者有限。加上「兒童」作為獨立的群體或概念於清末至五四時期被提出，主要源於「救國保種」的時代需求。這種表面獨立，實質附屬的身世，隨中國南來文人一併移植南洋。回顧二戰前乃至國家獨立後期間，馬華文學雖然難以擺脫歷史事件和政治局勢的牽引，仍能在多次的論戰中顧及文學主體的內部發展，唯兒童文學依舊處在邊緣。筆者認可兒童文學「作為文學及文化生產實踐場域的一環，有其不容小覷的社會建構力量與文化政治意涵」，<sup>5</sup>並以《兒童報》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此一華人民辦刊物於馬來西亞 1970 年代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能。

## 二、歷史語境與《兒童報》的誕生

二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情緒高漲，原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終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正式獨立為馬來亞聯邦，隨後

---

<sup>5</sup>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頁 25。

加入聯合國，並與英國保持互相協助的關係。而新加坡則在 1959 年獲得自治，內部安全和國防仍由英國負責至 1963 年過渡憲法結束。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亞聯邦、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聯合成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馬來西亞聯邦。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國。<sup>6</sup> 新、馬分家後，隨著兩國政策不同，原是文藝活動主要據點的新加坡，漸與馬來西亞疏遠，過往替馬來亞作家出版書籍，刊登馬來亞作家作品的景況不復，兩地的文藝事業也不如從前活躍。<sup>7</sup> 加上 1950 年以來，英國殖民政府和獨立後的馬來亞聯邦政府，對中國進口書籍有諸多限制甚至禁阻，馬來西亞的中文書源大受影響，市面嚴重缺乏中文讀物，兒童讀物也不例外。<sup>8</sup> 但也因此，一些文化人便開始嘗試設立出版社，印刷和出版叢書或期刊。《兒童報》便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其中之一。

《兒童報》(*Mingguan Kanak-kanak*) 創刊於 1972 年 3 月 7 日，<sup>9</sup>

---

6 詳見陳鴻瑜：《馬來西亞史》（臺北：蘭臺出版社，2012 年），第七章及第九章。

7 可參考林水椽、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再也：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1984 年），頁 384。

8 新、馬地區的書籍進口限制早在二戰前便已發生，當時受影響的主要是中國出版（因含有中國意識）的教科書。戰後，隨著馬來亞境內境外的局勢緊張，英殖民政府和後來的馬來亞政府先後數度下令限制進口各類華文書籍，如：1948 年進入緊急狀態並展開禁書，1956 年頒佈出版物售賣禁令，以及 1958 年對色情與紅色書刊的查禁，但實際上當中涉及的內容甚廣，連科學、教育、財經、體育、藝術、兒童書刊等都一併遭禁，故出現嚴重書荒。詳見周星衢基金會編著：《百年書業話星衢》（新加坡：周星衢基金與大眾控股有限公司，2019 年），頁 48-58；周維介：〈閑說禁書 60 年〉，《怡和世紀》，第 24 期（2014 年 10 月），頁 33-42。

9 為行文簡潔之便，本文除引用外，後續提及本報僅以期數標註。

是一份八開十二版的民辦週刊，售價為馬幣 10 仙（10 cent），由馬來西亞《通報》<sup>10</sup> 老板周瑞標之子周寶振的自立公司——生活出版社出版發行，<sup>11</sup> 社長周寶梅，周寶振任董事經理。《兒童報》編輯團隊甚為簡單，由顧問周祖慶、主編年紅和編委梁誌慶、方理以及業餘繪圖人王照義五人組成。《兒童報》包含兒童文學、學生作文、語文知識、科普數學、漫畫、連環圖等等綜合內容，主要讀者群為華語源流學校小學生。每期《兒童報》由顧問周祖慶<sup>12</sup> 負責專欄「周叔叔的話」，主編年紅<sup>13</sup> 負責兒童文學和語文知識等九版內容，梁誌慶<sup>14</sup> 負責學生作文稿投「綠園」、「新地」、「詩葉」、

---

<sup>10</sup> 《通報》創於 1957 年，與三日刊《達報》合併而成，由周瑞標創辦。1968 年改為日報，1981 年由馬來西亞華人政黨馬華公會通過華仁控股公司收購，1992 年又轉讓給新協利集團，最後於 1994 年 8 月停刊。有關《通報》，見彭偉步：《新馬華文報文化、族群和國家認同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9 年），頁 49，和周瑞標之子周寶振所著的傳記體專書《從《通報》、《生活報》到《中國報》：大馬一代報王周寶振最後的 48 封電郵》（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8 年），當中記有《通報》從創刊到大起大落的點滴回憶。

<sup>11</sup> 生活出版社的旗艦報紙《新生活報》的前身是《生活報》，由已故資深報人周瑞標的子女周寶振、周寶梅等人籌辦，在 1972 年 12 月 15 日創刊。

<sup>12</sup> 周祖慶是南馬文藝研究會的顧問之一，也是麻坡中化中小學家長董事部委員之一，《南洋商報》工作委員會駐柔佛區的成員。

<sup>13</sup> 年紅（1939-），原名張發，筆名另有：魯師、晉溪、夏之雷、易兆等。麻坡人。服務華教三十九年。歷任南馬文藝研究會會長，現任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馬來西亞翻譯及創作協會副主席等職。曾獲得「首相敦拉薩文學獎」、「柔佛州文學作家獎」等多項獎項。著有《鴻沟》、《黃瓜公主》、《舞會》、《夜醫生》、《最後一趟巴士》、《少女圖》等百種書籍。

<sup>14</sup> 梁誌慶（1942-），原名梁雙慶，另有筆名高梁、梁田和勁旅等。師訓學院畢業後即任教職。擅長書寫散文、詩歌及文藝理論，並積極在校園推進

「苗圃」，方理<sup>15</sup>負責科學版，王照義則幫忙繪圖<sup>16</sup>。

發行管道方面，主要是透過《通報》代理把刊物派送至各華文學校銷售，部份則分配到代理書報攤檔擺售。初時銷量有四萬多份，後增至六萬份。<sup>17</sup>然而，這樣的售量與當時全國華文小學學生人數作比照，是不理想的。<sup>18</sup>在堅持了 51 期後，《兒童報》改為雙週刊。最終，《兒童報》於 1973 年 10 月 13 日出版了第 60 期後，就停刊了。主要原因有二：一、當時發生全球紙價暴漲，《兒童報》銷量不敷成本，難以支撐；<sup>19</sup>二、主編年紅被派至大型華校當校長，適逢政府剛通過公務員不得公然兼職的限制，其餘同是公務員身份的梁誌慶和方理也無法繼續支援編輯工作。<sup>20</sup>

《兒童報》的壽命不長，卻是 1970 年代初期極少數的馬華兒童

---

兒童創作。曾獲文化協會詩歌獎，著有《土地的兒女》、《黃花鄉鎮》、《聽石》、《給馬華兒童文學紮根》、《我愛家鄉》等。

<sup>15</sup> 方理（1936-2004），原名張慎修，另有筆名饒君。華文教育工作者。曾任南馬文藝研究會財政、理事，擅長散文及兒童科普文學。著有散文集《遲來的喜訊》，科學小品《太陽系漫談》、《美麗的彩虹》、《童聲飛揚》、《外星人》、《你認識什麼花》及《中國古代科學家的故事》等。

<sup>16</sup> 王照義，不詳。據年紅和梁誌慶口述，王照義與他們是同學關係，擅長繪畫，故邀他幫助插圖工作。

<sup>17</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40 年》，第三版（新山：彩虹出版社，2005 年），頁 180。

<sup>18</sup> 根據董總統計資料，1970 年馬來西亞有 1,346 所華小，學生總人數為 439,681。《華小董事參考資料》：<https://www.dongzong.my/infobook/book/Huaxiaodongshi.pdf>（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

<sup>19</sup> 周寶振：〈最好和最壞的運氣〉，《從《通報》、《生活報》到《中國報》：大馬一代報王周寶振最後的 48 封電郵》，頁 161-165。亦見馬漢：《兒童文學 50 年情》（吉隆坡：嘉陽出版社，2007 年），頁 106。

<sup>20</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頁 181。

文學刊物之一。出現於馬來西亞 1970 年代的華文兒童刊物不多，目前查有以下七種。（1）《少年樂園》：1964 由香港友聯出版社通過少年樂園出版社創辦，1966 年停刊，1977 年復刊。（2）《學生周報》：原名為《中國學生周報》，其星馬版於 1956 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移至新加坡重新登記，並改名為《學生周報》。1958 年 8 月始改於吉隆坡發行，為中學生半月刊，後改名《學報》。（3）《知識報》：1965 年創刊於新加坡，新、馬分治後，另於新山註冊為知識報（馬）有限公司，此刊供小學高年級學生作課外讀物。（4）《知識畫報》：1976 年創刊，由知識報（馬）有限公司出版，為小學低年級學生讀物。（5）《小讀者》：1976 年創刊，1978 年停刊，由泛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為兒童綜合型雜誌。（6）《好學生》半月刊：1977 年創刊，由好讀者出版社出版，為少兒綜合型雜誌。（7）《好少年》月刊：1979 年創刊，1980 年停刊，由好少年出版社編印。綜觀以上刊物，首二份皆由香港友聯出版社資助出版，前者以連環圖畫故事為主要內容，後者以中學生為讀者群，這兩份刊物的營運和編輯情況頗為複雜，目前學界仍在探究中。而由新、馬出版發行的《知識報》雖歷史悠久，但內容著重語文練習和作業，對本土兒童文學的推廣有限。至於《知識畫報》（與《知識報》同樣著重語文練習和作業）、《小讀者》、《好學生》及《好少年》，皆創刊於 1976 年之後，當時的政經與文化情境已有所不同。<sup>21</sup> 如此，《兒童報》

---

<sup>21</sup> 以上資料乃綜合參考自：年紅：〈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的發展〉，《兒童文學 40 年》（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29-248；馬漢：《兒童文學 50 年情》；舒慶祥：《星洲日報》大柔佛版〈《知識報》與楊錫坤〉：[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83245.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83245.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0 日）；姚拓：〈《學生周報》的發起與沒落〉，《雪泥鴻爪》（吉隆坡：紅蜻蜓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565-569，以及許通元發表於「華

可說是 1970 年代初政權變動之時，率先創刊而又登載大量馬華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純本土華資兒童期刊。其所體現的辦刊精神與風格，是一種文學與文化實踐的證明，也是特定時代精神的反映，更程度不同地在馬華兒童文學創作方面影響著 1975 後創刊的兒童雜誌。

步入 1970 年代的馬來西亞，曾經歷不少大事件。儘管在政體上已經擺脫殖民統治，但作為多元民族構成的新興國家，馬來西亞卻一直無法很好地解決種族衝突問題。除了 1965 年新、馬分家的政體重整外，在教育和經濟上的政策實施也引發國內各種族的激烈反應。在教育方面，沿續了《1956 年拉薩報告書》<sup>22</sup> 的教育體制建議而逐步落實「以國語（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最終目標」，相關措施包括規定公共考試須採用官方語文出題，升學資格以國語科及格為必須條件。這嚴重影響華校學生的教育機會，故華人社團和政團積極向政府爭取列華文為官方語文，卻屢屢失敗。然而，英語列為官方語文的議案卻在 1967 年被通過。同年頒佈的國語法令，更將國語地位提高並鞏固至獨尊狀態。<sup>23</sup> 在經濟方面，自 1950 年到 1970 年間所實施的四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都以發展馬來人農村地

---

語語系文學與口述傳統的對話」國際研討會的會議文章（未定稿）：〈《蕉風》這道謎題：從友聯與亞洲基金談起〉（2020 年 12 月 28 日）。

<sup>22</sup> 《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是 1955 年 8 月馬來亞聯合邦大選後，由聯盟政黨成立的一個以教育部長阿都拉薩為主席，包括三大民族代表共十五人的教育委員會，檢討和制定新的國家教育制度。原為《1956 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後以教育部長拉薩為代稱。見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出版社，2017 年），頁 74；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1 年），頁 294-320。

<sup>23</sup> 有關國語政策及教育政策，詳見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第三、四章；陳鴻瑜編著：《馬來西亞史》，第九章。

區為核心目標。<sup>24</sup> 這都為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種族暴動「五一三事件」埋下伏筆。1969 年大選，反對黨取得大勝並遊行慶祝，因有人言行過激，引起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肢體衝突，此事件對馬來西亞往後的發展影響深遠。<sup>25</sup>

這些事件發生後，第一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因馬來族群的政治鬥爭壓力下，於 1970 年 9 月辭職，由副相首阿都拉薩（Abdul Razak）接任首相。敦拉薩掌權後，以遵循國家原則之「團結國民」為名，於 1971 年陸續推出新經濟政策和國家文化政策。1971 年推行的第二個馬來西亞五年計劃（Rancangan Malaysia Kedua 1971-1975）主要在於消除貧困和重建社會經濟，以達致國民團結的目標。計劃中的某些措施對教育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包括推行以種族比例錄取國立大專院校入學者的種族固打制政策，中小學校的發展經費配額不均，加強落實國語政策，統一強化教育制度以促進國民融洽和團結。<sup>26</sup> 同年，政府宣佈國家文化政策，以三大原則將馬來族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定為國家文化政策的推行準則：（1）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原住民的文化為核心；（2）其他適合及恰當的文化原素可被接受為國家文化的原素，但是必須符合第一及第三

---

<sup>24</sup> 林勇：《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經濟地位變化比較研究（1957-200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一、二章。

<sup>25</sup> 1969 年「5.13 事件」可參考陳鴻瑜編著：《馬來西亞史》，第九章；廖文輝編著：《馬來西亞史》（雙溪毛糯：馬來亞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頁 381-382。

<sup>26</sup>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1975》：<https://policy.asiapacificenergy.org/sites/default/files/2nd%20MP.pdf>（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11 日）；林水椽、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編著：《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一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 年），頁 184；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130-131。

項的概念才會被考慮；（3）回教為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sup>27</sup>

以上事件都涉及各族群在政經文教多方面的資源與權益分配問題，且明顯加強保障馬來民族在各方面的權益。《兒童報》的誕生，正趕上了政權更替之初，新政權管理者急於施展和表現政綱之際。故此，《兒童報》的文化定位難以無視官方監督的可能。因為，她與其他所有報刊書籍一樣，是傳播文化、溝通思想、傳遞信息的工具，是統治者、當權者賴以制造公共話語的重要管道之一。<sup>28</sup>

在創刊號上，周祖慶以周叔叔身份向讀者表示《兒童報》的宗旨，是鑒於「兒童是國家的命脈」，兒童時代是學習的黃金時代，故「要向小朋友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藉此和大家談些功課的學習，和如何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和睦兄弟姐妹，及親善各民族朋友的課題」（創刊號首版）。這番宣言傳達了中立平和的普及理念，只為給當時缺乏課外讀物的孩童一份益於學習的刊物。

然而，受邀於創刊號上致獻辭的教育部長胡辛翁<sup>29</sup>，則為這份刊物賦予特定的使命。他寫道：

兒童報的出版是非常合時的，因為我們今天這一代人非常需要各種讀物，特別是供兒童讀的報紙，以增進他們的知識，同時亦刊登政府聲明，以傳達家長與兒童。……通過知識與

<sup>27</sup> 引自何國忠〈獨立後華人文化思想〉，收入何啟良、賴觀福、林水椽、何國忠主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第三冊》（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年），頁52。

<sup>28</sup>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業長時期受到政府監視，動輒勒令停業進行調查，或以言論激烈之由吊銷營業執照。

<sup>29</sup> 胡辛翁（Hussein Onn, 1922-1990），又作胡先翁或胡申翁，與第二任首相敦拉薩屬堂表親關係。1970-1973年間出任教育部長，後擢升為副首相兼貿易與工業部長，敦拉薩逝世後，他於1976-1981年間出任馬來西亞第三任首相。

閱讀，我們亦可加強各族人民之團結，特別是馬來西亞之人民。……希望它將塑造各種族，宗教與文化，人民之間互相尊重的感情，而成為一個馬來西亞民族。<sup>30</sup>

這番獻詞中對《兒童報》的期許——傳達官方言說，協助促進各族團結，成就馬來西亞國族——無疑飽含政治話語，甚至是政治宣言。究竟是否剛好這也是編輯團隊之辦刊初衷，抑或是不得已的求存策略，綜觀全六十期《兒童報》的欄目設置和內容主題比例，皆很大程度地呼應了當時的國家政策。在複雜迭變的歷史與政治語境下，《兒童報》的文化定位究竟如何？編輯方針和風格又是如何？

### 三、同人特質濃厚的辦刊旨趣

據年紅回憶，他與周祖慶於 1971 年曾有過一次談話，二人感嘆當時華文小學缺乏兒童讀物。<sup>31</sup> 周祖慶提議申辦一份兒童刊物，由他與生活出版社接洽，而當時身為南馬文藝研究會長的年紅，原就有意推廣本土兒童文學的發展，在理念相通的情況下，兩人一拍即合，促成《兒童報》的誕生。由於周祖慶與《通報》此一周氏家族集團關係密切，獲周寶振所創之生活出版社支持申辦，並將編輯部設於馬六甲麻坡市。年紅隨即邀請南文會成員梁誌慶和方理等人

---

<sup>30</sup> 教育部長胡辛翁獻詞：〈今年剛好宣佈「國際書籍年」，兒童報出版是合時宜的〉，《兒童報》，創刊號（1972 年 3 月 7 日）。

<sup>31</sup> 在馬來西亞，以中文為教學媒介的小學，因《1956 年拉薩報告書》而分為私立小學和津貼小學。津貼小學又分為以國語（馬來語）為教育媒介語的「標準小學」，和以英、華或淡米爾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標準型小學」。所有學校均需採用一個共同課程。《兒童報》的受眾主要指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小學生，以及失學的離校生。

組成編輯團隊<sup>32</sup>，成員皆為馬六甲州人士，同是身兼教師和寫作人、或媒體工作者的身份，地緣和業緣使然，對教育和文藝事業有著共同的志趣與使命，默契十足。《兒童報》辦刊過程雖然辛勞，出版公司每月僅撥發 200 元津貼予四人均分<sup>33</sup>，彼此卻和氣相融。如此，《兒童報》的同人關係可說是直接影響著該刊的文藝取向。

### （一）多層關係的同人角色功能

所謂同人，指志趣相同或共事者。而同人特質的刊物則往往體現在以一人為中心，號召志同道合者組成一學會，或一同辦雜誌，其所表現的政治傾向，文藝觀點大概一致，而且編輯主體與創作主體的身份重疊。<sup>34</sup>就《兒童報》編輯群的同人特質是多層面的。他們同時具備文藝愛好者的文友關係，同是南馬文藝研究會此文藝組織的會友關係，同是教育工作者的同業關係。此外，他們更是麻坡人的同鄉關係，地緣性極強。這多層密切的關係建立起《兒童報》編輯成員的深厚情誼，故合作無間，辦刊方針一致，文藝風格穩定。這還得回到南馬文藝研究會此一地方文藝組織談起。

南馬文藝研究會，簡稱南文會。1968 年底，南馬區文友黃崖、遊枝、高秀、夢平、年紅、謝又齋、馬漢、蔡淡、華山、梁誌慶、林過、莊延波、陳靈、李壽章、林金福等，有鑒於彼

<sup>32</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40 年》，頁 180。

<sup>33</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40 年》，頁 180。

<sup>34</sup> 以上有關同人刊物和同人性質的界定，取自學界對起源於五四時期同人辦刊的集體現象之研究，並引用《現代》雜誌主編施蟄存〈《現代》雜憶〉中有關同人刊物的解說。

此經常保持聯繫，並且共同負起推動文藝工作，於是籌組「南馬文藝研究會」。期間文友們進行了幾次「文藝座談會」電臺錄音節目。1969年9月30日，南文會正式成立，獲得顧問黃潤岳、韋暈、黃崖、謝又齋，贊助人及會友們的大力扶掖支持。寫作是南文會的本位，亦推廣五大藝術源流：音樂、文學、美術、戲劇和攝影的活動。南文會並不標榜派系，主張求同存異，全力支持馬華文藝發展的活動，儘可能與其他文藝團體合作，發揮群體力量共同負起推動文藝的活動。南文會會員散居柔佛和麻六甲兩州，每年三幾次的聚餐會，作為聚首研討文學創作問題及推動會務之用。若臨時遇上難題，便以書面或會議投票方式來表達意見。為了加強聯繫，南文會理事會選出版《會訊》。南文會成立後，在主席年紅帶動下，成員馬漢、高秀、夢平、梁誌慶等積極參與推展兒童文學的創作與活動，使該會成為馬華兒童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據點。<sup>35</sup>

年紅和梁誌慶可說是南文會的靈魂人物，從創會迄今，分別擔任會長和秘書職位，而方理亦在組織中先後擔任稽查、委員、財政等職。南文會的向心力很強，成立後「從不向外募捐，一切費用完全由會友們自掏荷包攤付」，「會內也從未有爭名奪權的現象」，即使偶有磨擦，也能互相包容，「群策群力，貫徹推動文藝的宗旨」。<sup>36</sup> 南文會成立首三年所辦過的活動與兒童文學並無直接關聯。

<sup>35</sup> 梁誌慶：〈從成長到茁壯——這三十年來的南馬文藝研究會〉，《茁壯——30週年會友合集》（麻坡：南馬文藝研究會，1998年），頁49-50。

<sup>36</sup> 梁誌慶：〈從成長到茁壯——這三十年來的南馬文藝研究會〉，《茁壯——30週年會友合集》，頁49-50。

如 1969 年聯合麻坡影藝社舉辦的「大馬兒童影展」和「陳培志畫展」；1970 年與麻坡中華總商會舉辦的全馬首創「非華人華文班」；1971 年與麻坡漳泉公會及江廈黃氏公會主辦的毫芒雕刻家「黃老奮個展」，同年與馬六甲培風中學聯辦的「李晉華兒童專題影展」等。直到 1972 年參與《兒童報》的編輯工作，方正式與兒童文學有直接關聯。

南文會後來被視為 1970 年代以來發展馬華兒童文學的重要組織，主要還是年紅這位會長的引領和推動。年紅將個人對兒童文學的興趣，結合南文會「推展和提昇文學與藝術，發揚民族和國家文化」<sup>37</sup>的宗旨，並知人善用，把各有專長的梁誌慶和方理邀來共同編輯《兒童報》。三人會友同人的關係在辦刊活動中發揮團結力量，不計辛勞和象徵性的薄酬，只為彼此共同的興趣和理想奮鬥，這在三人的回憶散文或口述採訪中都曾言及。此外，我們也看到年紅如何在有限條件下，仍能善用活動資源，讓南文會與《兒童報》相互支援，實踐他個人的同時也是南文會和《兒童報》三者的理想。因為兒童攝影展活動後來成為《兒童報》「兒童影集」版面延續推展的材料，這一方面得以繼續南文會推廣文藝的使命，一方面也拉近《兒童報》與關聯受眾——家長之間的距離，皆有助於推銷《兒童報》。故年紅、梁誌慶和方理的同人關係與角色發揮，對《兒童報》和南文會而言，意義重大。

## (二) 推廣華文兒童文學

《兒童報》包含兒童小說、兒童詩、兒童廣播劇、科學故事、

<sup>37</sup> 年紅：〈序〉，《茁壯——30 週年會友合集》，無頁碼。

寓言、童話、謎語、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多種形式的作品。除了連環圖、漫畫和部份文學作品轉載自中國、香港、臺灣外，其餘多是本土作家和學生的作品，這在同時期的兒童刊物而言，是少見的。<sup>38</sup> 這與編輯年紅、梁誌慶、方理三位南文會的作家有關。

新、馬分家後，馬華文學也跟著分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和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在 1960 年代末的過渡階段，馬華文壇明顯沉寂。南馬文藝研究會的創立正是為了支持馬華文藝活動發展，與其他文藝團體合作，發揮群體力量，共同負起推動文藝的工作。<sup>39</sup> 尤其是備受冷落的兒童文學，更是該會秉持「別人不做，我們做」精神下致力推展的重點活動。加上年紅、梁誌慶、蔡淡<sup>40</sup> 等人向來熱愛兒童文學寫作，並有相當的作品發表、獲獎紀錄和地方知名度，編輯《兒童報》此舉更正式把馬華兒童文學推向新的發展。

馬華兒童文學向來以現實主義小說為主，即使是戰後曾經盛行的兒童劇和本土文藝思潮，也沒有在題材、體裁和藝術手法上有所突破。只有東南亞民間文學中合適少年兒童閱讀的故事，因有助於建立本土認同感和反殖民意識，故出現譯介熱潮。到了獨立前後，印尼和馬來民間故事或寓言更因其語種淵源，以及國語運動的盛行

---

<sup>38</sup> 年紅曾在論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分家後的少兒讀物發展時，認為當時的少兒刊物本來就不多，廣受歡迎的《知識報》在「內容方面，除了發表學生習作之外，寓言、故事、神話、遊記……都屬剪報，對於本地的兒童文學發展，沒有積極性的作用」。見〈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的發展〉，《兒童文學 40 年》，頁 238。

<sup>39</sup> 梁誌慶：〈從成長到茁壯——這三十年來的南馬文藝研究會〉，《茁壯——30 週年會友合集》，頁 49。

<sup>40</sup> 蔡淡（1944-），原名蔡錦芝，另署王鍾。生於柔佛麻坡，1970 年代擔任華商報執行總編輯多年，後從商。曾任南文會財政多年，也曾為 1972 年出版的《李晉華兒童攝影集》撰寫童詩三十一首。見《茁壯》，頁 235。

而大量湧現。例如：詹熊編譯的《婆羅洲民間故事》（1962）、筱林等譯的《百靈鹿的故事》（1952）、Peter H. H. Howes 豪士原著、黃俊賢譯的《陸達雅克民間故事集》（1961）、陸泉的《馬來寓言》（1960）、蕭堅的《馬來亞歷史故事》（1961）、年紅的《黃瓜公主》（1962）等等。這些譯著其實並非為兒童出版，而是因應當時許多正在學習馬來語或想多了解馬來文學的華人之廣泛需求。然而，這無意間帶動了馬華兒童文學的譯介活動，也影響著《兒童報》兒童文學版的內容選材和創作及譯作導向。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兒童報》雖為華人投資和出版編輯的刊物，卻出現大量的馬來文學譯作，包括民間故事、寓言和童詩。

《兒童報》除了轉載中國和外國兒童文學作品，亦刊登許多本土作家作品，當中如生活故事、寓言、童詩、科學故事等，多出自年紅、梁誌慶、方理以及南馬文藝研究會文友之手，而三位編輯專長各異，更是相輔相成。

梁誌慶擅長童詩創作，而且熱心於作文指導，其所負責的學生習作版面「綠園」、「新地」、「詩葉」、「苗圃」，每期都寫有評語，教導小學生如何創作。他長期在麻坡中華基督小學任教，並擔任華文學會寫作班的導師，非常熱衷於童詩創作與教學。《兒童報》每期 2 至 4 版的學生稿投，平均佔全刊近百分之三十的篇幅，對培養本土兒童小說和童詩寫作風氣有很大貢獻。

方理是位科學老師，熱愛文學與科學，更擅長結合二者的特點，以生動有趣的文學語言和敘事手法傳達科學知識，吸引小讀者，這在馬華兒童文學作家裡頭是極為少見的。他分別以方理、修、饒君、張老師等筆名編寫每期的知識版，欄目如「太陽系漫談」、「美麗的彩虹」、「馬來西亞常見的動物」、「馬來西亞常見的植物」、「中

國古代科學家的故事」，將生物、物理、天文、植物等等科普知識進行趣味化改寫，實踐「花兒蟲兒皆文章」<sup>41</sup>的理念。這些科學小品文後來結集為《太陽系漫談》、《美麗的彩虹》、《你認識什麼花》、《中國古代科學家的故事》<sup>42</sup>等等著作。

而主編年紅是《兒童報》的靈魂人物，他不僅熟悉國內外兒童文學，更勇於嘗試各種體裁創作，是個多面手。他負責「兒童文學版」，身兼創作、翻譯、選稿、邀稿、改寫、轉載等多重工作，為小讀者推介了豐富多元的兒童文學作品，包括童話、寓言、民間故事、笑話、童詩、兒歌、小說、敘事詩、歷史故事、科幻故事、古代笑話、謎語、圖畫詩、成語故事、廣播劇等等。當中以兒童廣播劇和寓言的推廣尤值得注意，因為這在馬華文壇極為罕見。

年紅在 1965 年開始接觸兒童廣播劇。他受邀為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教育廣播組編寫劇本，由於年紅的劇本照顧到兒童語文能力水平，受當時節目主任彭質斐欣賞，薦為特約撰稿員，並參加國內外主辦的兒童劇本撰寫培訓課程。<sup>43</sup> 據年紅所言，由於廣播劇無需舞臺佈景和服裝道具，只需備有錄音和播音系統，這在學校裡頭更易操作，也是當時政府大力推行的教育活動。所以在那幾年間，他寫了百多

---

<sup>41</sup> 方理：〈花兒蟲兒皆文章〉，《童聲飛揚》（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 57-59。

<sup>42</sup> 張慎修編著：《太陽系漫談》、《美麗的彩虹》（新加坡：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5 年）；方理編著：《你認識什麼花》、《中國古代科學家的故事》（麻坡：南馬文藝研究會，1986 年）。儘管如此，方理仍感慨馬來西亞兒童文學作家在兒童科普方面的作品很少。方理：〈我談「兒童科學文藝」及創作經過〉，《童聲飛揚》，（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頁 xvii-xxiii。

<sup>43</sup> 年紅：〈自序〉，《教育廣播劇本集——清道夫》（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頁 viii-ix。

個生活故事劇本，每部約 2,500 個字，供 15 至 20 分鐘廣播之用。<sup>44</sup>雖然年紅在《兒童報》上發表的教育廣播劇不多，只有《新年禮物》（第 35 期）、《十棵小樹》（第 49 期）、《女班長》（第 54-55 期），但卻引起小讀者對廣播劇作的學習模仿，可惜《兒童報》在不久後便停刊，所發揮的培養效果沒有童詩和生活故事來得明顯。<sup>45</sup>

《兒童報》也很關心半工讀的小學生，除了年紅多次刊登半工讀兒童的照片並在旁題詩寫文外，「綠園」、「新地」裡的學生作文，內容多描寫貧苦學生如何家境貧寒，如何刻苦耐勞、奮發向上。這些作文園地裡也常出現離校生、自修生的文章，足見編輯們希望通過這些文章激勵這些家境困難或失學的少年兒童，同時也教育學生不應歧視他們，更要珍惜求學機會。<sup>46</sup>

為了提昇小學生的作文能力，《兒童報》也刊登一系列作文指導文章，如：文非的〈作文的修辭〉（第 27 期）、何老師的〈多讀書是提高作文水準的好方法〉（第 28 期）和〈略談修辭〉（第 32 期）、柳明的〈寫作三要〉（第 33 期）、〈寫作漫談：成功非僥倖〉（第 41 期）等等。此外，梁誌慶在作文園地裡的細膩點評和鼓勵，以及邀小讀者寫個人投稿心得，這些都成功引起他們的寫

---

<sup>44</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40 年》，頁 178-180。

<sup>45</sup> 僅有甲洞英校的劉心琴在第 43 期的「綠園」發表獨幕劇〈考試之前〉。編者評為「全劇主旨正確，談話生動，不會有枯燥的感覺」。

<sup>46</sup> 周祖慶在「周叔叔的話」裡曾提到 1965 年新、馬分家後，「六年來，西馬小學，有十萬三千多個小朋友，停學離開了學校」，經教育部調查，原因有：一、家長（尤其是鄉村地區）忽視子女的教育，這也許是家庭貧窮的原因；二、一些家庭因子女眾多，父母無法負擔課本、學雜費和校車載送車資等費用，致使年紀較大的孩子中途退學，去當學徒。見《兒童報》第 3 期。

作興趣。<sup>47</sup>《兒童報》還設計專題筆談刺激小讀者思考，抒發己見。例如：「我對武俠片的看法」、「我對留長髮的看法」、「我怎樣幫忙做家務」、「我怎樣處理零用錢」、「什麼時候我感到最快樂」等等，這都引起很大反響，來稿需分多期刊載。<sup>48</sup>經過這些寫作指導後，我們可以看到《兒童報》上所刊登的作文水平日漸提昇，不再侷限個人家庭和自述式作文，而出現了擴大視野的取材，如國內各名勝地遊記、割膠或鄉村生活、訪馬來友人、國慶日及各節慶描繪等等，本土元素愈加鮮明。至於童詩方面，也因梁誌慶的細心指點而明顯進步許多，意見箱裡亦有小讀者留言希望增加「詩葉」刊登的次數（第 56 期）。《兒童報》後來更將學生們的文章擇優結集成《希望在明天》，出版後搶售一空。

梁誌慶（梁田）在《希望在明天》序言裡重申「提供健康讀物，培養閱讀興趣」是《兒童報》的宗旨，從闢置寫作園地到出版佳作選集，都是為了實踐此一宗旨。他以編者身份道出他一年多來的讀稿感受，一如他給學生們的循循善誘，真摯而誠懇：

作為學生作品版編者的我，每天都在閱讀著同學們的來稿，

---

<sup>47</sup> 見第 22 期的「投稿專題」，梁誌慶就收集了〈我怎樣投稿〉、〈我投稿的目的〉、〈投稿記〉、〈我投稿的經過〉等多篇心得，給有意投稿或投稿失敗的學生參考和觀摩。這些文章不僅分享個人的投稿經驗，而且也談及投稿的心態，起著教育學生建立健康正面的寫作觀念之作用。又如第 15 期的「會客室」裡，有小讀者黃宗明致函編者梁田，感謝他在「讀稿隨筆」和「文章短評」裡的點評，使他「懂得在寫作時如何避免重蹈舊轍和欣賞文章」，「今後在練習寫作上很有幫助」。

<sup>48</sup> 例如第 57 期的「意見箱」裡，就有小讀者李愛雲來函建議多設筆談討論問題，增進大家對該問題的認識，並認為這樣可以使「青年朋友們明白是非，分辨善惡，更可以喚醒迷途的同學們，面對現實」，更可以「把灰黃的文化來驅除，把敗壞的風氣來消滅」。

他們純真的感情，對是非善惡分明的態度，都深深地感動了我。令我覺得他們是有一股寫作衝勁的，而且飽含著寫作的才能，如果能夠好好地加以鼓勵和引導，這些小作家將來一定有成就的。<sup>49</sup>

綜上，《兒童報》對馬華兒童文學的推廣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且與編輯群一致的讀者定位、文化使命以及精神品格息息相關。從文學史角度來看，這些各樣式的本土作家作品如寓言、童詩、兒童小說、兒童散文、教育劇作、教育雜文、科學小品、譯作及兒歌等等，是馬華兒童文學於 1970 年代的重要成果，對當時擁有五十年歷史卻產量極少的馬華兒童文學而言，意義非凡。從出版文化角度來看，除了學生習作、漫畫、語文練習等常見內容外，《兒童報》欄位設計的最大突破是發表大量本土兒童文學作品，而同時期的兒童刊物則多為剪報作品<sup>50</sup>，同時也對 1975 後新創的刊物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於 1979 年創刊的《好少年》月刊，主編馬漢便強調該刊是「刊登馬華作家創作的兒童文學（包括小說、散文和童詩）的本地出版刊物」。<sup>51</sup>

---

<sup>49</sup> 《兒童報》第 54 期第 1 版（1973 年 8 月 7 日），亦載梁田（梁誌慶）主編：〈序〉，《希望在明天》（吉隆坡：生活出版社，1973）。

<sup>50</sup> 年紅在撰述馬華兒童刊物的發展時，提及當時很受歡迎的本土刊物《知識報》多屬「剪報，對於本地的兒童文學發展，沒有積極性的作用」，而同個出版社於 1976 年推出的低年級讀物《知識畫報》「在內容方面未見大量採用本地兒童創作作品」。見年紅：〈馬來西亞華文兒童文學的發展〉，《兒童文學 40 年》，頁 238、240。

<sup>51</sup> 馬漢：《兒童文學 50 年情》，頁 104-105。

#### 四、國家政策導向的知識傳播

戰後二十年間，冷戰格局的成形和亞洲發生的系列重大事件，都影響著甫脫離殖民統治的東南亞各新生國家急需構建本國意識形態、發展本國文化的方向選擇。<sup>52</sup> 這往往表現在刻意遠離西方模式，致力建構本國本族的文化認同。而本國國語和教育則是國家機器藉以推進國家知識建構的最有效媒介，唯民主式或專制式的國家主義下的政策制定將直接影響不同民族的生存狀態。

新、馬華人一向重視教育，故對各時期政府所頒佈的教育政策極為關注。前文提及 1956 年的《拉薩報告書》更緊箍著非馬來人的教育發展。為了達致最終目標「把各族兒童集中在一個以國語（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制度下」，政府制定各項法令為公私立學校提供執行指導。<sup>53</sup> 1970 年以前，各源流學校分別逐步納入國家教育體系，成為接受政府全部津貼的標準小學（以國語為教學媒介語）或標準型小學（以英、華或淡米爾語為教學媒介語），私立小學越來越少。「70 年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因為從 1970 年開始，國家教育語文政策起了非常大的轉變：英文源流小學從一年級開始逐年被改制成以馬來文為媒介語的國小。直到 1976 年，西馬半島已經沒有英文源流小學的存在了，而東馬的英文小學則在 1982 年亦全部被改為國小。」<sup>54</sup> 英文源流小學的逐漸改制，無疑是種預警。就在 1967 年被通過為官方語言的英語，尚且無法以此法定地

---

<sup>52</sup> 賀聖達：〈國際關係影響下的戰後東南亞文化發展〉，《學術探索》，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69-77。

<sup>53</sup>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75。

<sup>54</sup>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145。

位保障英語源流教育，所有國民型／標準型英文小學，竟然在短短八年間全被改制。那連番被拒於官方語言行列外的華文，以及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其將面臨的危機，自然更使當地華人憂心。

早在英殖民時期，華文學校教科書內容的中國元素／中華元素已遭批評，到了反殖民和民族解放情緒高漲，強調馬來亞化的 1950 年代，重新編制「含有馬來亞聯邦的文化生活要素」<sup>55</sup> 的教科書勢在必行。如此，當時的教科書普遍出現反映本土民情風俗的內容和課文插圖，突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特色。<sup>56</sup> 然而，這些教科書中的中華傳統文化內容並未因此而消失，只是在選文的思想內容上作出調整，例如：與政黨有關或不合地宜的景、事、物，都改為馬來亞或世界各地歷史名人，以及東南亞人文風土的介紹。但對於能夠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思想價值的內容，仍舊保留。兼顧中華性和本土性，可說是國家獨立前後華人出版社的共識，並隨著馬來西亞華人完成在地身份認同後，轉化為華人性與馬來西亞化的雙重價值認可。這種複式的文化認同，顯然也是《兒童報》編輯人員的共識。

### （一）輔助母語教育與國家教育

作為一份刊物，《兒童報》具有記錄、傳播、保存知識和信息的作用，並與大部份兒童刊物相似，基於閱讀對象的關係，編輯內容以語文、文學和教育為核心知識。《兒童報》編輯人員皆是全職小學教師，非常熟悉小學教育注重基礎知識和健康人格的培育，亦從教學經驗中了解學生的需求。據他們憶述，總結如下：1、

<sup>55</sup>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76。

<sup>56</sup> 有關馬來西亞華校教科書的演變，可參考禰素薇：《馬華兒童文學研究：文化傳承與本土色彩》（新加坡：青年書局，2006）。

當時市面上缺乏益於學習的兒童讀物；2、在教學過程中發現華小學生的華語水平嚴重下降；3、在教學過程中發現華小學生的國語學習能力不足；4、雖然政府提供小學六年免費教育，當時仍有很多學生因家境貧窮而影響學習，甚至中途休學。因此，《兒童報》志在提供有益的兒童讀物，輔助母語教育（民族教育）和國家教育，希望有助解決以上問題。

國語是團結各兄弟民族的工具，學好國語不僅對個人有幫助，對社會同樣有好處。

另一方面大家也不應該忽視母語的學習，我們是馬來西亞的華人，一向有著優秀的傳統，如果學好華文，我們便能從閱讀方面承襲許多華人的優秀精神。<sup>57</sup>

以上這番話可視為《兒童報》雙重文化定位的最好證明。

首先，為提供基礎知識的學習材料，《兒童報》編有固定版面制作馬、華、英三語和科普數及史地練習，又設文學、史地和科學版加強介紹相關知識。

其次，《兒童報》通過中國名人故事、中國民間故事、連環圖畫故事、教育散文、輔導信箱、成語故事等，來傳達兼具華人傳統道德觀和不分種族的普世道德觀。這可說是為著兼顧華文教育／民族教育與國家教育的需求，也符合《兒童報》的創刊宗旨，「藉此和大家談些功課的學習，和如何孝順父母，尊敬老師，和睦兄弟姐妹，及親善各民族朋友的課題」（創刊號）。

然而，這些核心知識的側重面，除了取決於編輯的辦刊目的，及其專業知識、經驗和綜合文化素養外，也受外延的政治環境和官方話語所影響。尤其是 1970 年所通過的國家原則（Rukun Negara/

<sup>57</sup> 〈周叔叔的話〉，《兒童報》第 44 期第 1 版（1973 年 1 月 2 日）。

National Principles) —— 「信奉上蒼。忠於君國。維護憲法。尊崇法治。培養德行」，正是為了團結各族人民及培養愛國精神而制定的人民守則。<sup>58</sup> 這些守則被規定為中小學教育的課程要素，以培養各族學生良好的紀律和品德及愛國精神。<sup>59</sup>

就以史地版來說，所制作的史地知識注重本國的或是世界的，即可反映其內在意圖。以下整理出來的地方志篇目主要偏向本國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其次是世界地理，但幾乎不涉及中國地方文化知識。這可說是延續了獨立前後強調本土化／馬來亞化的文化認同取向，在空間上捨去不合地宜的中國地方知識，取之以強化有關本土及週邊國家地理名勝、風土人文之介紹，這是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常見的用以建構國家／國族認同的知識制造模式，在馬來西亞也被延伸為愛國精神的一種體現。顯然，《兒童報》對此極為重視和認同。

表一：馬來西亞地方志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11	我國人口	43	馬六甲河與馬六甲
25	我國風光——黑風洞	44	丁加奴——海龜生蛋
26	我國風光——國會大廈	45	霹靂的首府——怡保
27	吉隆坡湖濱公園	46	怡保三寶洞花園
29	國家博物院	47	怡保南天洞
30	獨立體育場	48	怡保霹靂洞

<sup>58</sup> 有關馬來西亞「國家原則」內容，見於《馬來西亞「國家原則」(Rukun Malaysia/ National Principles)》：<https://www.malaysia.gov.my/portal/content/30110>（瀏覽日期：2020年12月19日）。

<sup>59</sup>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129。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31	國家回教堂	49	霹靂河
32	我國風光 —— 梳邦飛機場	50	我國風光 —— 淘錫
33	我國風光 —— 星柔長堤	51	金馬崙高原
34	我國風光 —— 我國南方門戶新山	52	金馬崙高原裕林甲村
		53	金馬崙採茶姑娘
37	麻坡依士灣大橋	54	金馬崙山頂的人工湖
38	古城 —— 馬六甲	56	金馬崙的瀑布
39	馬六甲聖保羅天主堂	57	瓜拉江沙皇宮
40	東西馬的最高峰	58	美麗的太平湖
40	馬六甲聖芳濟天主堂	59	霹靂近打河
41	馬六甲馬來風光	60	檳城
42	馬六甲的鄉間牛車		

表二：東南亞地方志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19	緬甸的長頸婦女	39	新加坡人口
24	文萊發現宋人石碑	40	越南的簡史
36	緬甸的新年 —— 潑水節	41	佛教之國 —— 柬埔寨
36	菲律賓的新年	42	吳哥窟
38	詩之島 —— 巴厘	44	印度支那屋脊 —— 寮國
39	越南		

表三：世界地方志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11	北極的冰山	31	中東是指什麼地方？
12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會場	33	金門之都：三藩市
13	拿破侖的故鄉——科西嘉島	35	以色列人的新年
14	世界有名的大峽谷	35	巴格達的冬天
14	最早的文件（埃及造紙）	35	南非土人的新年
15	世界最小的國家——安道爾	45	古代的中國與阿拉伯
16	水鄉威尼斯	47	龐貝古城
17	狄斯奈世界樂園	48	紐西蘭的發現
18	瑞法意的大隧道	48	馬爾加什的島民生活
19	科威特——富有的小王國	49	尼日爾的遊牧民族
20	大笨鐘	49	北冰洋
21	泰姬陵	50	剛果的小人村和螞蟻
21	地球上的火山	51	丹麥的奇鐘
22	危地馬拉	52	北歐五國
22	美國的「北京」	52	世界獵奇
24	加拿大的名城——溫哥華		——最古的畫
26	歐洲小山國——列支敦士登	57	非洲的古國
26	英聯邦成員國		——埃塞爾比亞
28	比薩斜塔	58	巴庫圖人的習俗
29	揭穿南極之謎	59	美麗的山城
29	印度古代人骨		——亞的斯亞貝巴

除了本土名勝地理外，《兒童報》在科學版內也同樣強化本國花木鳥獸的知識介紹，前文提及由方理編撰的專欄系列「馬來西亞常見的動物」、「馬來西亞常見的植物」，也是有意識的服務此目的。

然而，誠如上文所言，《兒童報》的編輯風格呈現華人性與馬來西亞化的雙重定位，有關前者的元素雖不見於史地版面，卻大量出現在人物志和連環圖民間故事中，呈現了華人民族品格與國民品格的結合輸導。

如果說，地方志的目的是為了向兒童宣導吾愛吾土的愛國意識，那名人故事、成語故事、勵志故事和雜文的教育目的則是為了培養兒童的道德觀，塑造其健康良好的品格。

和地方志剛好相反，《兒童報》中的人物志名單裡絕少出現馬來西亞歷史名人。唯一出現的是吉隆坡開埠功臣華人甲必丹葉亞來（第 20 期），其餘全是中國名人或勵志故事。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有成就的馬來名人或歷史人物很少，而且多未能蓋棺論定。若選擇介紹太多南洋華人開埠功臣或名人，又怕引來種族沙文主義之嫌，故只能在地方志上取材。而當時的地方志材料豐富，因為殖民時代早有採風活動，到了 1930、1940 年代，南洋研究更是興盛，出版品眾多。而中國與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名人故事、成語故事和民間故事豐富，要從中選出富有教育意義的材料不難。而這些故事當中除了中華民族所特別重視的孝道以外，其餘的行為品格內涵如：誠實、勤勞、刻苦、奮鬥、堅忍、友愛、互助、包容寬恕等等，都通用於各民族的兒童教育，故並未抵觸國家政策或權力集團所標榜的國族構想。

表四：中國人物志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13	大禹治水	51	小女英雄——荀灌
15	中國古代的大科學家 ——祖沖之	53	煉丹家——陶弘景
		54	科學家——宋應星
18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 ——張衡	56	農業科學家——趙過
		57	孝子蔡順
23	中國古代機械工程師 ——馬鈞	59	升大夫的馬夫
		60	醫學祖師——扁鵲
32	偉大的中醫師——李時珍		

表五：世界人物志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11	諾貝爾	27	細菌學鼻祖
13	哥白尼		——巴斯德(上)
14	愛因斯坦的童年	28	細菌學鼻祖
16	伽利略		——巴斯德(下)
19	大數學家愛因斯坦	30	富蘭克林
25	牛頓	43	生物學家——達爾文

《兒童報》也通過各專欄和雜文來教育兒童，例如署名魏老師的「每週話題」，就刊有〈了解〉(第2期)、〈領受〉(第3期)、〈談孝〉(第5期)、〈為學〉及〈交通的重要〉(第6期)、〈有病要看醫生〉(第7期)、〈說話的禮貌〉(第16期)、〈積極向學〉

（第 24 期）、〈信義〉（第 25 期）、〈儲蓄〉（第 29 期）、〈維護健康〉（第 31 期）、〈日行一善〉（第 36 期）等等。

又如「唐姐姐講道理」專欄，就寫有以下文章，這些原創的教育散文或雜文雖然說教意味重，卻很好地反映了《兒童報》的教育觀——即是希望培養小讀者當個品學兼備的好兒童。

表六：「唐姐姐講道理」專欄各期篇名

期數	篇名	期數	篇名
5	無題	40	養成自治能力／ 勤奮讀書求進取
6	睡前要刷牙		
7	排隊是好習慣	42	盡力做個好孩子／ 懂得廢物利用
10	走路有益健康		
12	我們要孝敬父母	44	多幫忙新同學／ 別人對你的讚美
15	訓練說話的能力		
23	不要亂發脾氣	45	做個好孩子
29	勇於改過的人	46	我們要有責任感
30	撲滅蚊蠅防疾病	47	多聽兒童故事
31	要有公德心 / 說謊要改掉	48	努力讀書求進步
34	愛惜你的用物／ 做個好哥哥好姐姐	50	忙的好處
		51	不要諱疾忌醫
36	食量要適宜／ 不要干無聊的事	54	從玩具說起
		55	寫筆記有進步
38	勇於助人的精神	56	隨口批評最缺德
39	過馬路要小心	58	注意身體整潔

此外，《兒童報》也和馬來亞婆羅洲金融行（MBF）聯辦貧苦學生助學金，幫助有需要的華小學生。亦經常配合宣導國家新近頒佈的消息，讓小讀者了解，如：政府宣佈禁止燃放炮竹（第 1 期）、政府成立聾啞學校（第 2 期）、教育部頒佈新的國語拼音法（第 24、26、28 期）、馬新貨幣等值終止（第 53 期）、新任副首相任職（第 60 期）、馬來西亞實施公制取代英制（第 58 期），等等消息。

## （二）鼓吹國語學習，響應國族建構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聯合邦）宣告獨立。當時憲法明文規定國家語文為馬來語，十年後，馬來西亞國會通過國語法，馬來語成為西馬唯一的官方語言。<sup>60</sup> 語文的合法性直接影響教育媒介語和語言使用者的文化與身份認同，故一直是馬來西亞各民族間爭辯不休的課題。但隨著 1967 年國語法的通過，以及 1971 年的國家文化政策，馬來西亞從原先相對多元主義式的文化結構，轉向以馬來族為中心和伊斯蘭化的同質文化與價值取向。就連國家文學也僅指向以國語書寫的作品方符合資格。國家所賦予馬來語和以馬來人為主的特殊權力與優待，迫使非馬來人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實際上，非馬來人對馬來語被定為國語的態度不一，但大致並不反對，只是不贊成馬來語被獨尊為唯一的官方用語，而將其他民族的語言邊緣化。從獨立前後所湧現的鼓吹國語運動的民間刊物和國語學習班，以及大量的馬來語文工具書、文學譯著和雙語對照書籍，都說明了

---

<sup>60</sup> 有關馬來西亞語文政策，可參考陳鴻瑜：《馬來西亞史》，頁 362-364；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頁 514-518；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1415-2015）與華教發展》，頁 112-115，等等。

各族對國語運動的支持和響應。

《兒童報》主編年紅正是這段歷史的全程參與者，他對國語的學習經歷始於 1958 年。馬來亞雖獨立於 1957 年，但政府早在 1956 年便根據《拉薩報告書》的建議進行教育改革。為逐步實踐單一語言源流的教育體制，教育部開設日間師訓中心，為擁有初級文憑或初中會考文憑的學員，提供一項以學校源流教學媒介語，及馬來語為第二語文的師資訓練課程，為期三年。<sup>61</sup> 1958 年 3 月，年紅考入日間師訓學院，放棄了熟悉的英語，選修馬來語，其最大的考驗是須在三年內學習馬來文並考獲中三程度的水平。毫無基礎下的語文學習固然艱難，卻激發年紅的鬥志，他「為自己編訂學好馬來文的方針，方法之一便是選擇比較有趣味性的馬來民間故事讀本來閱讀」，有時也把喜歡的故事帶到教學實習堂上講給小學生聽，竟大受歡迎。<sup>62</sup> 他繼而把這類馬來民間故事和寓言改寫，在報刊發表，讓更多小讀者閱讀。1962 年，更吸引到香港維明公司為他出版單行本，也即是馬來寓言故事集《黃瓜公主》。<sup>63</sup> 從此，年紅對馬來語的學習熱忱和文學創作的興趣更濃。

年紅深深明白國語地位的日愈重要，這將直接影響下一代華族學生的教育與未來出路，加上有感於自身學習國語過程的辛苦，故立志幫助華族小學生學好國語。這份理念充份體現到《兒童報》的編輯內容上。

---

<sup>61</sup>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1415-2015）與華教發展》，頁 108。

<sup>62</sup> 年紅：〈三十年的歷程——我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 40 年》，頁 177-178；年紅：〈他，帶著榮耀離去——想起克理斯·瑪斯〉，《愛心相連》（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55。

<sup>63</sup> 年紅：〈他，帶著榮耀離去——想起克理斯·瑪斯〉，《愛心相連》，頁 55。

首先是由年紅負責的兒童文學版，每期固定有馬來寓言故事、民間故事或童詩「班頓」(pantun)的譯介，這些都由年紅挑選和翻譯，有的更是年紅的原創作品。

其次，《兒童報》幾乎每期都編有馬來文、華語、英文三種語文練習，或不定期有數理、科學、歷史、地理等練習題。當中馬來語練習和「班頓」介紹尤其常見。

再者，漫畫與連環圖中的文字，自第 5 期始，全都附有年紅的馬來語翻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兒童報》自創刊起，便設置一項「國語優秀獎」，鼓勵小學生學好國語。「凡國語會話，作文或演講成績優越者，在有關校長推薦下，將有機會獲得獎勵，每星期錄取二位，每次發出獎金十元」（創刊號）。此獎項由馬來亞婆羅洲金融行(MBF)所贊助，其用意為鼓勵兒童培養儲蓄習慣外，亦為「配合著政府推行努力學國語的政策」。

「國語優秀獎」的設立無疑是為了鼓勵兒童學好國語，其標語「學好國語，是做好公民的必備條件」（創刊號），是小學標準課程的總目標，也是馬來西亞獨立前後政府一直強調的國民資格和效忠條件。到了 1965 年的教育政策改革後，更是所有公立考試和津貼學校的規定使用語。淡米爾語和華語源流小學生升上初中後，所有課程將全面以國語授課。初中會考無法考獲國語優等者，無法升讀高中，這將面臨失學。身為小學基礎教育工作者的年紅，對此深感憂心。故藉由《兒童報》提供趣味性較強的學習材料，以輔助小學生培養學習國語的興趣。

在同時期的兒童刊物裡，《兒童報》設立「國語優秀獎」可說是項創舉，也是編輯們的用心良苦。可惜這獎項後因受薦名單極少

而不定期頒發，到第 38 期後就不見有獲獎人。比起同是馬婆金融贊助的「貧苦助學金」，「國語優秀獎」的成效相差甚遠。儘管編輯已經多次呼籲各校校長踴躍提名國語學習表現出色的學生，但原訂每週選取二位得獎者的目標，很少達成，甚至是長時期懸空。而唯一寫有得獎感言的吳雅迅，可說是道出了這個獎項的文化與政治立意：

國語現在已在我國被各階層人士廣泛地運用，我認為凡是馬來西亞公民都應該學習它，如果各族公民都能精通國語，那麼語言便不會隔膜，大家更可互信互重，團結一致，使我國更繁榮、更進步。<sup>64</sup>

以上一切，都在在證明《兒童報》（或應該說是年紅會更為貼切）對國語學習運動的熱烈支持。年紅推動國語學習的熱忱，並非僅僅出於對翻譯或改寫馬來寓言、民間故事的個人喜好，而是將之視為促進各民族文化和感情交流的途徑。1971 年，年紅的自譯童詩〈飛鳥〉（*Burung Yang Terbang*）榮獲「敦拉薩文學獎」詩歌獎，成為當時馬來文壇上首位得獎的非馬來人。<sup>65</sup> 這個獎項對年紅而言，

<sup>64</sup> 吳雅迅：〈我學習國語的心得〉，《兒童報》，第 26 期第 12 版（1972 年 9 月 26 日）。

<sup>65</sup> 「敦拉薩文學獎」（*Hadiah Karya Sastra*）是由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敦拉薩於 1971 年 7 月所設立，曾在 1977 年至 1981 年間停辦，並於 1982 年和 1996 年先後改為「馬來西亞文學獎」（*Hadiah Sastra Malaysia*）和「馬來西亞首相文學獎」（*Hadiah Sastra Perdana Malaysia [HSPM] / Prime Malaysia Literature Prize*），此獎雖可接受非馬來人資格，但與「國家文學」無關。此獎由當時的首相敦拉薩及其委任小組所設立，主要是為了落實 1971 年制訂的國家文化政策中有關重建族群和諧關係之精神主旨。在當時，能獲此獎是種很高的殊榮，《兒童報》也在第 7 期的首版特別祝賀年紅。可參考：莊華興：〈馬來文學的建制化：進程與吊詭〉，《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

意義重大，因為此獎項的設置宗旨是為了給予促進社會進步、國家繁榮的文學一種國家級的肯定。加上他與國家語文局溫和派的馬來作家相知相識，這更堅定了他意欲通過文學譯介的交流方式以突破種族隔閡的信念。<sup>66</sup> 年紅後來在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和馬來西亞各民族作家理事會擔任要職，繼續從事文學譯介工作。

如上可見，《兒童報》裡有關國語文練習、連環圖和漫畫翻譯、馬來班頓譯介、馬來語文工具書推介消息、馬來文習作、新聞翻譯、國語優秀獎，等等的設計，都證明了該刊對國家政策的積極配合，但也同時流露謹言慎行、步步為營的編輯態度。

## 五、結語：

### 從（民族的）精神糧食到（國民的）團結願景

#### ——《兒童報》的雙重定位

《兒童報》是 1970 年代馬來西亞政權再變時期罕見的兒童刊物，其壽命雖然只有一年零七個月，但發行期數穩定，整體編輯風

---

（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5 年），頁 168-170；張玉珊：〈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論述及其問題研究〉（中壢：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sup>66</sup> 「五一三事件」對年紅的衝擊很大，他曾在多篇散文中提及那場經歷，皆以「慘痛」形容之。1970 年中，他為此發起南文會與麻坡中華總商會、麻坡青年會聯辦「富有時代意義和使命的『非華人華文班』」，從起初的三四十人報名，到後來的四百多人，當中有師訓學院同學，有地方官員、軍警人員、工人和商賈，一度引起社會關注。可惜只辦了一屆就因經費不足而後繼無力。但由此可見年紅為改善族群關係所作的努力是多方面的。見年紅：〈架起民族間的親善津樑〉，《愛心相連》（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32-35。

格一致，是觀察馬華兒童文學階段性發展的重要材料，相關文獻卻僅見於少數人的回憶文章。本文從該刊的本土特質如歷史事件、國家政策、華人投資者發行人、編輯團隊，以及所刊載的核心知識內容，分析當中的同人關係和個人特質如何影響該刊的編輯方針和運作方式，以及如何以既定的國家政策為總導向，再用他們的方式尋求對話，追求民族母語與國家共同語、民族教育與國家教育、民族文學與國家文學相容共存的理想。

作為一份小型民辦刊物，《兒童報》創刊時即獲收全國二十七個來自政府／非政府機關的個別與集體（包括各中小學校長、督學、政治人物、各州教師公會等）的賀誌，而且在銷售量上達 4 萬份一期，《兒童報》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可見一斑。<sup>67</sup> 可惜這樣的銷量仍無法為資方帶來厚利，又逢 1973 年發生全球性紙荒，成本高漲，嚴重衝擊當時的出版業。<sup>68</sup> 生活出版有限公司曾以縮減《兒童報》版面

<sup>67</sup> 據年紅、馬漢、姚拓等人的回述文章，1970 年代可見的兒童刊物之售量：如《學生周報》每期 1 萬多份、《好學生》半月刊達 2 萬 5 千本，長青樹《知識報》、《知識畫報》售量曾高達 8 萬份，故《兒童報》有 4 萬份售量，仍被資方認為營利不敷成本，這很大程度與 1973 年爆發的全球性紙荒有關。見年紅《兒童文學 40 年》、馬漢《兒童文學 50 年情》，以及姚拓《雪泥鴻爪》。

<sup>68</sup> 有關 1973 年全球性紙荒問題，可見於當時的新聞報導：《星洲日報》第 13 版（1973 年 11 月 5 日）〈紙荒對馬星報業的影響〉：<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731105-1.2.59.2?ST=1&AT>（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星洲日報》第 3 版（1973 年 10 月 2 日），〈國際性紙荒及其影響〉：<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731002-1.2.36.6?ST=1&AT=advanced&K>（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南洋商報》第 5 版（1973 年 6 月 15 日）〈供應短缺 紙張價格飛漲 大馬報業公會研究合理調整華文報費 雪華派報同業表示諒解〉：<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

的方式應對紙價增漲問題<sup>69</sup>，但由於該公司所經營的其他業務亦遭遇困難，故難以支持。<sup>70</sup> 實際上，最後一期《兒童報》發行時，並未有停刊宣佈，甚至還發出「筆談徵稿」，歡迎小讀者就學生佳作選集出版事宜提出意見，可見資方與編輯部並未放棄《兒童報》。<sup>71</sup> 《兒童報》最終在沒有正式公告的情況下停刊，這一方面印證了兒童讀物難抵其商品屬性的壓力之遺憾，亦有時不我予之嘆。因為馬來西亞英語源流學校自 1970 年開始改制，到 1975 年後，已幾乎完全轉為國語源流之國民小學，故許多家長將孩子送往華語源流小學，導致華小學生人數激增。<sup>72</sup> 這或可解釋為何在 1976 年開始，新增了多

---

nysp19730615-1.2.15.5?ST=1&AT=advanced&K=（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sup>69</sup> 《兒童報》在第 44 期發出減版啟事：「由於印制原料價格高漲，兒童報決定由第四十五期開始每次出版兩張半（即十大版），調整後的內容，將取消『快樂誕辰』，以及縮小一些其他版位，編輯們研究結果，都認為不會影響原來豐富的內容。」

<sup>70</sup> 生活出版社老板周寶振在憶述其家族所經營的出版事業時，曾提及 1973 年 10 月爆發的中東戰爭引發石油禁運，油價暴漲造成紙張短缺。而他又剛好在 1972 年創立《生活報》，並在 1973 年以鉅資買下廠房和印刷機器，以為此舉可以配合發展出版和印務工作，結果無紙可印。加上家族所經營的《通報》面臨工潮和政治壓力，唇齒相依的生活出版社陷入極大困境。對這接踵而至的考驗，周寶振形容 1974 年「是有生以來最多災難的一年」。見〈最好和最壞的運氣〉，《從《通報》、《生活報》到《中國報》：大馬一代報王周寶振最後的 48 封電郵》，頁 161-165。

<sup>71</sup> 見《兒童報》，第 60 期第 13 版（1973 年 10 月 10 日）。而在年紅和梁誌慶的訪談和文章中，均提到《兒童報》的停刊年份為 1974 年，相信生活出版社與編輯部是經過一番掙扎，最終在 1974 年決定正式停辦。

<sup>72</sup> 有關英語源流小學和中學改制，以及 1970-1980 年各源流教育發展中華小學生人數激增數據，可參見（《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頁 131、頁 145。）

家出版社發行兒童刊物。可惜《兒童報》雖成功把握 1970 年代初的契機搶先誕生，卻因紙張風暴未能撐到市場大開之時。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年紅因公務員身份不得兼差此一政府新訂法規而辭去編輯職務，同為公務員的梁誌慶和方理亦隨之退出，這也導致《兒童報》無法擺脫同人刊物常因核心人物離去而解散的宿命。且不論《兒童報》達致多大的成效，其在當時強勢的政治環境中仍奮力嘗試堅持文化理想和教育理念，以兼顧民族精神糧食和國民團結願景的雙重定位方式，爭取共存實踐，這已經值得肯定。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方理：《童聲飛揚》，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2. 年紅：《兒童文學 40 年》，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3. 年紅：《愛心相連》，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4. 年紅：《教育廣播劇本集——清道夫》，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
5. 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6. 林水椽、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再也：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1984 年。
7. 林水椽、何啟良、何國忠、賴觀福編著：《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 年。
8. 林勇：《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經濟地位變化比較研究（1957-2005）》，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年。
9. 《兒童報（1-60 期）》，八打靈再也：生活出版社，1972-1973 年。
10. 馬漢：《兒童文學 50 年情》，吉隆坡：嘉陽出版社，2007 年。
11. 陳鴻瑜：《馬來西亞史》，臺北：蘭臺出版社，2012 年。
12. 莫順生編撰：《馬來西亞教育史 1415-2015 與華教發展》，加影：新紀元大學學院出版社，2017 年。
13. 吳玫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

14. 周星衢基金會編著：《百年書業話星衢》，新加坡：周星衢基金與大眾控股有限公司，2019 年。
15. 周寶振：《從《通報》、《生活報》到《中國報》：大馬一代報王周寶振最後的 48 封電郵》，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8 年。
16. 姚拓：《雪泥鴻爪》，吉隆坡：紅蜻蜓出版社，2005 年。
17. 梁誌慶：《茁壯——30 週年會友合集》，麻坡：南馬文藝研究會出版，1998 年。
18. 梁田編：《希望在明天》，吉隆坡：生活出版社，1973 年。
19. 莊華興：《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5 年。
20. 廖文輝編著：《馬來西亞史》，雙溪毛糯：馬來亞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
21.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第三分冊，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2001 年。
22. 禰素薇：《馬華兒童文學研究：文化傳承與本土色彩》，新加坡：青年書局，2006 年。

## 二、學位論文

1. 張玉珊撰：〈馬來西亞國文學的論述及其問題研究〉，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 三、期刊論文

1. 周維介：〈閑說禁書 60 年〉，《怡和世紀》，第 24 期，2014 年 10 月，頁 33-42。

2. 許通元：〈《蕉風》這道謎題：從友聯與亞洲基金談起〉，「華語語系文學與口述傳統的對話」國際研討會，2020 年 12 月 28 日，未定稿。
3. 賀聖達：〈國際關係影響下的戰後東南亞文化發展〉，《學術探索》，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69-77。

#### 四、網路文獻

1. 〈《知識報》與楊錫坤〉，《星洲日報》大柔佛版：[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83245.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83245.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0 日。
2. 《華小董事參考資料》：<https://www.dongzong.my/infobook/book/Huaxiaodongshi.pdf>，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
3.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1975》：<https://policy.asiapacificenergy.org/sites/default/files/2nd%20MP.pdf>，瀏覽日期：2020 年 10 月 11 日。
4. 《馬來西亞「國家原則」(Rukun Malaysia/ National Principles)》：<https://www.malaysia.gov.my/portal/content/30110>，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5. 〈紙荒對馬星報業的影響〉，《星洲日報》第 13 版，1973 年 11 月 5 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731105-1.2.59.2?ST=1&AT>，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6. 〈國際性紙荒及其影響〉，《星洲日報》第 3 版，1973 年 10 月 2 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cjp19731002-1.2.36.6?ST=1&AT=advanced&K>，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7. 〈供應短缺 紙張價格飛漲 大馬報業公會研究合理調整華文報費雪華派報 同業表示諒解〉，《南洋商報》第 5 版，1973 年 6 月 15 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nysp19730615-1.2.15.5?ST=1&AT=advanced&K=>，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